

文化随思录

THOUGHTS ON THE CULTURE

王梓坤

(一) 历史的启示

近年来文化建设已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，所以“热”，是由于长时期的“冷”。多年来的思想统治和禁锢，加上十年文化摧残，人们渴求着思想的清新和解放。随着改革开放的迅速发展，西方文化思潮大量涌入，诸如弗洛伊德、萨特、尼采、迪斯科、摇滚乐、武打和凶杀片等等，都一时成为时髦，尽管其中一些在国外已成古董。于是发生一个问题：怎样对待现代的西方文化？热烈鼓掌主张全盘西化者有之，痛心疾首厉声斥责者有之，超然物外听其自然者亦有之。

在我国文化史上，至少有三件大事可供借鉴。一是先秦诸子百家的争鸣；二是佛学的传入，它与我国儒家、道家的交汇以及其后对我国哲学、文学、艺术的影响；三是从清朝开始，西方科学及民主思潮的输入，“五四”运动达到一个高峰，至今仍在发展中。历史证明，各种文化的接触，其结果大都是取长补短相互渗透，凝聚成新的、并存的更高的文化，而不是以一种文化取代或吞并另一种而告终。原因很简单。各种文化都充满人民的生活气息，具有民族或地方的特色；加之以历史长期严格的考验和筛选，保留下来的大都是精华部分，自有其存在的价值。因此，多种文化的并存与融合乃是必然的结果。

目前西方文化的引入，从大处看，是件好事。问题在于如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，使其精华与我国传统文化相结合。

(二) 一百个第一

我们不可能列举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，只能作一些粗浅的分析。目前流行的西方文化可大略分为四类：科学技术、民主自由意识、社会科学和哲学、文学艺术。

科学技术无国界，对之主要是吸收、消化和利用。应该考虑我国的需要及经济条件，有步骤地引进，否则必会大量耗费人力和财力，食而不化反受其害。有些课题，虽属尖端，但处于探索阶段，成败未卜而又耗资亿万者，可让别人先试，然后实行“拿来主义”。其实科技中的拿来，乃是普遍现象。一项重要的发明、发现，总是先在某处突破，然后，传遍世界，绝少是几国同时突破的。《日本精神》一书中说：“在日本人看来，不利用国外先进技术而花费精力和资金去搞发明纯粹是愚蠢之极。”这是事情的一面。另一面则应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与可能，搞好几项具有重大意义的项目，办出本国的水平和特色。

人生活在开放的环境中，无论自然或社会，都不可能给他以绝对的自由。我们的躯体不断被氧化，被衰老侵蚀，古代许多帝王梦想长生，都传为笑柄，这说明大自然的无情。同样，我们生活在社会中，社会抚育了我，我当然应该热爱祖国，热爱人民，遵守法纪，尊重地方的风俗习惯。这些既是个人道德的表现，也是社会对大家的约束。人们只能在这些约束下谈论民主自由。另一方面，政府应该保护人民，给人民以充分的言论自由；在重大决

策上尊重人民的意见；特别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，应该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民主选举产生，并严格实行任期制，决不允许私相授受或变相的私传，也不允许在一个小圈子内被指定。国家的政治生活中，没有比选择最高领导人更重大的事件了。十亿人民中的优秀者，比一千人中的优秀者更优秀，这不是极明显的道理吗？国家最高领导人，应该品德高尚，有最高的智慧，有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；在当今文明时代，他们还应有最高或很高的学历，这一点也不容忽视。

西方的社会科学和哲学，无疑有许多珍宝，但也有不少问题。希罗多德的《历史》，我国司马迁的《史记》，将交相辉映，永垂不朽；马基雅维里的《君主论》，说雄主必须兼有狮子的凶狠和狐狸的狡猾，可与我国韩非子的法、势、术学说相媲美。又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论，潜意识说是其精华，但过分强调性的作用，恐系臆断，至于什么“男婴恋母，女婴恋父”，则是谬论了。系统地介绍西方哲学各派的观点，罗素的《西方哲学史》是一部很好的著作。

我国有许多优美的文学作品如《红楼梦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三国演义》等，但推理小说则很少。《福尔摩斯探案集》独树一帜，值得一读，从中可以学到一些观察和推理的方法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，出现了许多战争小说和间谍小说，其中如《战争风云》等堪称上乘，读之可添智慧。

不要枉自菲薄，轻视我国的文化与科学。《新华文摘》1987年第六期起，连载了罗伯特·坦普尔写的“中国的一百个世界第一”。火药、指南针、印刷术、造纸、瓷器等为我国首创，这是周知的常识，但未必都知道火柴、漆、米酒、太阳风、太阳黑子、营养缺乏症、西门子式炼钢法、血液循环等的发明或研究，我国也居于世界前列。我国历史科学的完备、博大与精深，恐怕无一他国所能望其项背；至于中国的文学、哲学、艺术等的成就，更是有目共睹、交口称誉了。

（三）高素质的人民

何谓“文化”？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，不必在此评述。我们只想讨论一个问题：文化的主要作用是什么？是积累知识，还是丰富生活？我认为，这些都是文化的功能，但不是最主要的，文化的主要作用，应是不断提高全民的素质，包括全体人民的思想品德、科技知识与能力、文学艺术修养和身体健

康等各方面的素质。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平，不只表现在极少数杰出人物的突出成就上，而主要在于全民族的素质。办好几个研究所，在几项课题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，或者培养几个优秀运动员、艺术家，固然很不容易，但还不是最难的；最困难的，同时也是最重要的，是大面积提高全民的素质。这是一片汪洋大海，需要下几十年上百年的大功夫，先进的设备可以引进，而民族的素质是不能引进的。

二次大战以后，人们对国家兴旺的理解有很大的变化。过去说一个国家强大，主要指它的军事力量。能以武力称霸于世者为强国。由于科技发展，这种概念过时了。核战无胜负，现在国家兴旺的含义主要在于破愚贫而立智富。教育普及、科技先进、经济发达、人民文化水平高，才是国家兴旺的基本标志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，愚昧更不是社会主义。治愚与治贫，是一连环，愚必贫，贫则造成大量文盲而导致平均的愚。要解此连环，必须治愚与治贫同时并举，而治愚则更根本些。1945年日本投降时，许多城市成为一片瓦砾，吃饭成了大问题，但日本人却说：“要使日本复兴，除教育以外别无他途。我们由于战争而使国家荒芜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留给子孙后代，但是至少希望他们受到卓越的教育”（见吉田茂《激荡的百年史》）。仅仅过了两年，到1947年，日本便实行六三制（小学六年，初中三年）教育。长时间的坚持和努力，“使日本得到复兴的日本国民的素质”，作为文化国家，日本终于获得新生，成为经济大国。这也为解开上述连环提供了经验。

我国人口即将超过十一亿。人口多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人口多而素质又低。反之，如果素质高，则人口负担可成为人口资源。高质量的产品出自高质量的劳动者，高素质的人民才能建成高度文明的、富强的国家。十亿人口的大国，靠劳动力输出、靠外援、靠人人经商、或靠国际上偶然的会（如朝鲜战争为日本提供了订货输出的机会），都不能根本解决问题。唯一的途径是发展教育，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，而这需要长期的坚持和努力。急于求成，草率从事必将造成严重后果。要知道象日本这样的岛国的振兴也花了近百年的时间（明治维新始于1867年），而持久是最容易被急功好名的领导所忽视的。尽管我国宪法第十九条规定：“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，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”，但一些领导人还是口是心非，我行我素。学校危房倒塌，压死学生，仍时有所闻，更谈不上

校舍应该是当地最好的建筑了。如果在第十九条中加上一句：“国家每年对教育投资不少于国民生产总值的 4.5%，20 年不变”，也许会切实一些。据 1975 年到 1985 年一百多个国家的统计取平均值，世界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4.67%，所以上述要求并不高。

（四）会做许多事却不会做最重要的事

发展教育和科技需要大量资金，一些人视此为畏途。其实做任何大事（如新建一大厂），初期较多投资是不可少的，然后逐步减少，最后方可能进入高效益、低消耗的良性循环。不想通这一点，便做不成任何大事。列·托尔斯泰说：“有些人知道很多东西，却不知道最重要的东西。”同样，有些人会做很多事情，却不会做最重要的事情。而做成一两件大事往往需要多次大拼搏。任何国家的收入都是有限的，问题在于如何分配，而这又决定于政府决心要干成哪几件大事。为了达到目的，就必须压缩其他开支，降低其他项目的发展速度，以便把人、财、物集中到主要目标上来。穷于应付日常事务而无主要目标的领导是平庸的领导。任何伟人也只能做成一两件大事，华盛顿、林肯如此，斯大林、毛泽东也如此。我国的教育事业急待振兴，如果有那位领导人能对它做出突出贡献，仅此一项就将名垂青史，为后人所永远怀念。尼克松在《领袖们》中说：“当一位领袖遇到了需要他最大限度地发挥才能去应付挑战时，我们方能全面地衡量这位领袖有多么伟大。……没有挑战，他们就不能显示出英雄本色。”振兴教育，这是现阶段对我国的挑战，我们需要能显示本色的英雄。

英明的领导是重要的，但群众办学的积极性也非常重要。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财力资源，问题在于要让他们尝到或见到教育和科技的经济效益。不久前河北阳原县出现了“半斤青茭籽，富了一个乡”的好事，说的是由于科学种植青茭而劳动致富。1986 年 4 月 11 日《人民日报》载：对 262 个村庄调查，发现家庭收入与成员的最高文化程度成正相关。1984 年文盲户人均纯收入为 285 元，小学生户 385 元，初中户 466 元，高中户 556 元，大专户 756 元。大专户为文盲户的 2.6 倍，由此可见，形成“智促富，富促智”的良性循环，不仅是必要的，也是完全可能的。

要利用一切机会普及科学文化知识，例如在电影、电视放映前必须放几分钟的科技文化片，国家

花了许多钱去拍几十集马拉松式的电视剧，是否可多拍一些教育片、科技片、文化片、爱国英雄片呢？

（五）人口的输入与输出

人口问题可以看成为一个大系统，出生是输入，死亡为输出，教育、管理等为内部加工。要提高人口质量，首先需抓好出生。计划生育，非常重要，但它只控制数量；优生优育，更加重要，它涉及质量。如果生来呆痴，再好的教育也无济于事。我国呆痴或有其他先天疾病的人相当多，这已成为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。大脑的聪明度，至少依赖于三个因素：先天的遗传、脑的营养、后天的教育、学习和实践。遗传如何影响智力，还不很清楚，有正面的例子，也有反面的例子。二百年前，美国一位博学多才的神学家嘉纳塞·爱德华，其八代子孙中，13 人当大学校长，100 多位教授，60 多位医生，20 多名议员，120 人大学毕业，18 人当编辑，14 人创建大学或专科学校，还有副总统和大使。同时纽约有一酒鬼赌徒马克斯·朱克，其八代子孙中，有 300 多名乞丐流浪者，7 人被判死刑，63 人因偷盗等被判刑，喝酒死亡或残废达 400 人。这说明遗传有相当大的影响。但另一方面，纽约儿童救护会在 50 多年中，收留 28000 人，其父母多是乞丐流浪者，而这些孩子有 87% 成为出色或有用人才，伟大的科学家牛顿、法拉第、拉普拉斯等，其父母均泛泛一般。

优生学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问，决不要因它曾被种族主义者利用而摒弃，在群众中特别是新婚夫妇中普及优生优育知识是非常必要的。减少近亲婚姻、在最佳年龄段怀孕、怀孕前后不受 X 光照射，不轻用药物、预防疾病、加强营养等等，都有利于优生。大诗人陶渊明的儿子都不优秀，有人说这与陶渊明喜欢喝酒而酒后同房有关。

一个民族要有朝气，必须健康人多，青年人多。老龄社会不是理想的社会。健康长寿是好事，苟延残喘则是坏事，特别是身患不治之症，与其长年卧床，不如及时安乐而终。我们应该建立达观的寿命观，把寿命看得淡薄些，为婴儿腾出一些位置。人自茫茫宇宙中凝聚而来，又向茫茫宇宙中消散而去，只是物质存在形式的转变，聚散均得其所，又何足悲。一些人以为长寿很幸福，其实过分长寿则未必。设想我活到 120 岁，我的亲朋好友大都亡故，子女也已去世，三代以下的儿孙视我如路

人，社会视我为负担；更何况我的思维、感官都已衰退，食则无味，听则无声，视则无形，举步摇晃，长夜无眠，人们尽情欢乐，我却浑身疼痛。庄子亡妻，鼓盆而歌，未免太无情义，但到了老年，听其自然，适当减少一些医疗，不是不可取的。生命的价值在于贡献，最长寿的，是那些对人类、对社会作出了卓越贡献的人。列宁、司马迁、诸葛亮和鲁迅，都仅活了 54 岁左右，然而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，他们都将与历史并存。诚如柏拉图所说：“倘若你曾在生者中间像晨星那样辉煌，那么在死者群里便会似晚星般闪烁。”

（六）《蒙难妇童吁天录》

近来一部分人确实富起来了。劳动致富，应该提倡。但不少人靠邪门歪道发财，为此全国人民为之付出了巨大代价，损失分摊在每个人身上，甚至祸延子孙。这些人兴风作浪，除助长通货膨胀、物价乱涨而外，更严重的是道德败坏，法纪沦亡，社会上一些丑恶现象，已达到建国以来治安最低点（除文革中打砸抢而外），而且在更加恶化中，实在令人发指。

下面是一则可靠的报道：

郑州市密县王发财用 2 000 元买来一名 18 岁的四川姑娘，强行令其与大儿子王老包同居。王老包已经 36 岁，外貌不扬。姑娘不从，王老包全家动手，先将该女捆绑起来毒打，然后剥光衣服检查，继而用针扎女孩十指，并将她捆在床上双脚朝天，把铁铲烧红反复烙其双脚底板。该女百般求饶，嚎哭之声撕人肺腑。但这些无法无天之徒无动于衷，几次将疼痛休克的姑娘用水泼醒，继续施以毒刑，直至将其双脚烙焦仍不松绑，并把她禁闭起来，让王老包肆意奸淫污辱。该女被摧残得失去常态后，他们又将她转移继续监禁。

总算万幸，河南省妇联和市、县人民政府采取了紧急措施，受害者才得到解救。

此其小者也。更有拐卖幼童，断其肢体，驱使行乞以养活头人。

此其小者也。更有可惊者，乃有人说：人家花了钱买人。你要解救，就得用钱去赎。而且此种言论，甚至出于某些领导人之口。天下黑心谬论，有过于此者乎？

总之，不少地区贩卖妇女儿童，其惨毒有超两百年前美国买卖黑奴而过之。看来需要一部《新黑奴吁天录》亦即《蒙难妇童吁天录》；我们也期待林肯式英雄人物的出现。宪法第三十八条说：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，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、诽谤和诬告陷害。”政府的职责起码是要保护人民，特别是保护妇女和儿童；不保护人民的政府，也不值得人民去保护。我们深信，我国政府必将采取坚决措施，铲除拐卖童妇、贪污腐化、抢劫行凶等等社会公害，重新提倡“为人民服务”，使我中华大地，重开文明之花。

（七）孔子与鲁迅

1936 年 10 月 16 日，文星殒落，鲁迅不幸逝世。许多人送了挽联，佳作甚多。其中尤以郭沫若一联，构思巧而寓意深，录之如下：

孔子之前，无数孔子，孔子之后，一无孔子；
鲁迅之前，一无鲁迅，鲁迅之后，无数鲁迅。

此联不仅高度评价了鲁迅的学术地位与贡献，与孔子相提并论，而且指出了文化史上的两种现象。同为文化巨人，而二者情形却完全相反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是怎样形成的呢？与政治有无关系？二者对比，各有何意义？那一种对文化的繁荣更为有利？

因之，我们希望有一本好的中国文化史，系统地研究中国文化的发展及其传统等问题。可惜解放以来，似乎还未出版这样的书。最近重印了柳诒徵先生的《中国文化史》，那是 1947 年写的重头书，内容丰富，引述原著很多，有很高的学术价值。当然，我们更期待新的专著的出现。

本文作者 王梓坤（Wang Zikun）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，本刊编委。